

金融业开放加速 内外资企业均获利

■ 本报记者 王曼

日前,我国公布的《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19年版)》其中提到关于金融业的对外开放:外资对证券、基金、期货及寿险的投资比例限制均放宽至51%,且于2021年取消外资股比限制。在前不久举行的第十二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李克强总理表示,将深化金融服务业开放,将原来规定的2021年取消证券、期货、寿险外资股比限制提前至2020年实现。

“加速金融开放步伐意义重大,是我国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体现。”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刘英在接受《中国贸易报》记者采访时说,我国现阶段发展特别需要一个健康、规范、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而这方面仅靠国内还不够,金融业加速对外开放有助于我国加快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在当前贸易保护主义泛滥、跨境投资大幅度下行的背景下,我国积极出台落实促进投资贸易自由化便利化的举措,正展现了我国的开放决心和开放大国的姿态。

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经济政策委员会副主任徐洪才表示,金融业的对外开放是大势所趋,提前一年取消股比限制释放出了积极信号,我国不断为外商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随着我国金融业的发展,加大金融业的对外开放也说明了我们有信心、有能力、有条件引进外资,我国金融业不断发展壮大,也有了比较强的抗风险能力。”

三大国际评级机构落户中国,沪伦通的正式启动,富时罗素全球

股票指数系列纳入中国A股正式生效,中日ETF互通正式开通……可以看到我国金融业的开放取得了重要成果。

“未来,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的空间和潜力很大。”刘英介绍,目前外资资本占中国A股市值的比重仅为2%。外国金融资本占中国债券市场的比重也只有2.9%,外资银行资产占国内全部商业银行资产的比重为1.64%,外资保险公司占国内保险市场的比重为6.36%。

“金融业的对外开放会产生鲶鱼效应,对我国金融业发展有促进作用。”徐洪才指出,更多外资的到来会倒逼我国金融机构改革,我国金融机构在与素质较高、能力较强的外资金融机构合作时能够学习其先进经验,从而激发我国金融机构的活力和创新能力;同时,也会促进我国金融市场运行规则与国际接轨,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

“金融业的对外开放,给国内外企业都带来了巨大的红利。”刘英分析,加快金融业对外开放步伐,有利于深化我国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银行、证券、保险业加速对外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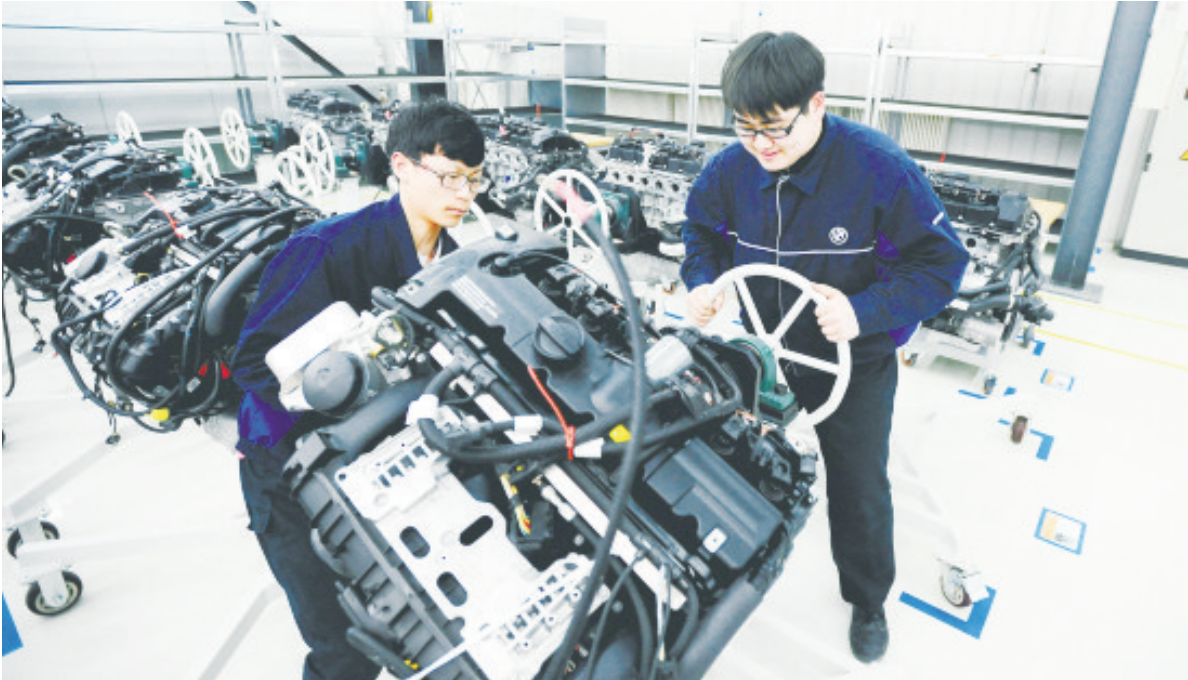
放,有助于引进优秀金融机构,尤其是随着风险管控、信用评级、消费金融、养老保险、健康保险等方面有专长的外资机构进入中国,进而填补空缺、创新金融产品,激发市场活力;从资本市场角度看,开放可以引入活水,当更多有品质、有质量、有规范的机构投资者进入我国,能够进一步优化我国金融结构。外资的进入能够实现充分竞争,有助于提高我国金融业的质量和效益,使得我国金融业能够真正地支撑实体经济增长,能够服务于百姓的需求;有助于我国金融企业做好防控风险,外资机构在全球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在防控风险方面做得比较好,我国金融企业在与之合作时,可以互相借鉴学习,能够学到一些更好的防控系统性风险发生的经验。金融业对外开放加速将助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给外国投资者也带来红利。

在刘英看来,为了提高我国金融业利用投资的质量,要努力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需要加强法治环境的构建,构建以防控风险、保护投资者、消费者为先的优良、公平公正、透明可预期的法制环境,引导内

外资金融机构合规经营、审慎经营;也要培育高素质复合型金融人才,保证我国金融人才能够满足外资金融机构的需求,同时外资机构可以给我国学生提供更多的实习机会,能够让学生真正实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增强自身实战本领。

受访专家表示,在金融业加快对外开放的同时,一定要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在首位。徐洪才认为,金融风险牵一发而动全身,要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金融开放要谨慎,要贯彻稳中求进的指导原则,做好预期管理,建立预测机制。应当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采取渐进方式推动金融开放创新,更好服务于实体经济。

刘英认为,在开放过程中需要控制风险,掌握开放的次序和节奏,需警惕如日本金融业那样在利率市场化还没有完成之时就盲目加速汇率自由化所造成的风险。尤其在贸易保护主义、债务金融风险高企的当下,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更需要防控风险、注意顺序,把握节奏;对外资金融机构更要加强监管,避免引进的金融机构滥竽充数。



华晨宝马铁西工厂位于辽宁省沈阳市,是德国宝马集团在全球的第25家工厂。华晨宝马铁西工厂拥有汽车制造的完整四大工艺,包括冲压、车身、涂装和总装四大车间。图为在沈阳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全新职业教育实训场地,工作人员在操作机器。

中国厂商赴印度布局手机产业链

■ 张素

市场分析机构Counterpoint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智慧海派成为印度第二大智能手机代工企业,占据该国智能手机出货量的12%。相关专家表示,一大批中国厂商相继在印度手机产业布局,印度手机产业链亦日趋成熟。

这份《2018年全球智能硬件代工制造(ODM/IDH/EMS)行业白皮书》对2018年全球智能硬件制造产业进行了分析及趋势预测,并对全球智能硬件ODM/IDH/EMS公司进行了评估排名。

此外,从Counterpoint发布的2019年第一季度手机智能机市场份额报告来看,中国品牌手机占这一季度

手机出货量印度市场总份额的66%。

业内人士分析,受“一带一路”倡议鼓励,一批具有前瞻意识的中国企业纷纷“出海”布局,手机制造业便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产业之一。随着国内智能手机市场几近饱和,东南亚、南亚、非洲等国际市场便成为中国手机制造商的新热土。

据统计,有人口大国之称的印度,其手机市场每年保持着15%的增长率,但智能手机渗透率仅为23%。鉴于此,中国手机终端品牌及OEM和ODM厂家纷纷赴印,以发掘该国在手机生产成本、产品价格、市场容量等方面的独特优势,加速业务向印度乃至全球市场的拓展步伐。

相关负责人介绍,依托与小米在手机、移动电源及其他产品领域积累的良好合作基础,智慧海派于2017年进入印度,在诺伊达地区设立制造基地。如今,该制造基地厂房总面积达4万平方米,配备了全自动的SMT生产线和专业的自动化装配流水线。二厂房正投入装修,预计未来海派印度将具备每月300万台智能手机的生产能力。

该负责人还表示,作为“中国制造”的一个代表,未来将继续以研发、制造、供应链服务的优势,为中印两国睦邻友好、为“一带一路”经济建设以及“印度制造”的转型升级持续注入力量。

园区定位、招商应强化垂直和针对性

■ 本报记者 刘国民

中外合作园区建设积累至今已经产生很多成果,这不仅仅表现在境外园区方面,也表现在中外合作境内园区方面。其中,中国和新加坡共建的苏州工业园被视为中外合作境内园区的佼佼者,此外还有中德、中意、中法、中意和中瑞等很多中外合作境内园区存在。笔者最近进一步观察了这些园区,发现中外合作境内园区的发展可以给国内园区的招商和运营很多启发。

首先,园区定位和对标的对象更加明确和有针对性。业内人士告诉笔者,中英(大连)先进制造产业示范园和荷兰中英绿色制造与再制造产业园都把学习英国的先进做法作为重要努力方向,其中中英(大连)先进制造产业示范园在英国考文垂设有办公室。中德沈阳装备制造业产业园则聚焦学习德国工业4.0的先进制造业,中以(酒泉)中小企业节水产业国际合作园区聚焦学习以色列先进的农业技术。在国内园区数量过剩,一些园区缺乏明确目标和方向的大环境下,这种有针对性、有明确学习对象的园区显得难能可贵。

其次,在国内园区数量庞大,又多被招商难题困扰的情况下,这种聚焦某一重点国别来进行垂直细分的园区,对某一国别的情况能形成更加深入的认识,能够捕捉到的商业信息更加深入全面,对潜在招商目标企业的情况也能够更了解。例如,一提到某个国别的企业,大家可能对该国

的世界500强企业名字很熟悉,然而该国这样的企业数量很少而且还被各国竞相招商,国内园区想要成功招到这样的企业入驻,即便付出很多心血也未必能成功。但如果对这个国别有了深入细致的观察就会发现,除了台面上最红的少数世界500强企业外,该国其实还有一批训练有素的中小企业以及知名度有限但很具实力的企业,比如德国的中小型先进制造业企业。有了这样的了解,才不会忽略该国众多的隐形冠军企业。如果园区能在这样的企业身上多下功夫,也能为招商带来一些意外收获,相当于另辟蹊径缓解了招商困难。

第三,在我国园区建设中硬件建设容易快速推进,而软件、服务无法快速跟上。其实做好服务要“懂”,懂园区、懂行业、懂国别,要突出重点和专业化,而不是面面俱到、泛泛而论。聚焦某个国别的中外合作境内园区,可以让园区建设深耕细作,这样才能更好、更专业地为入驻企业做好服务。

当然也要看到,即便有定位明确、针对性强的优点,也并非所有的中外合作境内园区都运转良好,有的园区引进的国外技术经多次尝试总是在国内水土不服难以市场化。这其实也告诉我们,在对标他国先进制造业技术或环保技术时,做到有针对性地学习借鉴还不够,还要在本土化方面多下功夫。这样才能诞生更多类似苏州工业园这样的中外合作园区佳作。

减负改善营商环境 企业发展劲儿更足

河南省财政厅、省税务局日前相继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该省企业营收总收入增加,税费减少,该省累计新增减税降费330.3亿元。这意味着,今年以来河南省落实国家更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实打实、硬碰硬,真正为企业带来了实惠。

7月8日,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副部长兰峰晒出了企业“减负账本”:初步统计,今年实施的减税措施预计年度可为企业在增值税及附加费方面节税8000万元左右,社保费节约400多万元,旅客运输服务新增抵扣税款50万元左右,员工个人所得税方面节税90万元左右。“这一轮减税降费力度空前,真正为企业和职工带来了红利,让企业发展劲儿更足。”兰峰说。

今年以来,河南省按照中央要求相继实施了小微企业普惠性减税、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社保费率降低、深化增值税改革等一系列减税降费措施。其中,深化增值税改革是减税降费中的“重头戏”,众多企业尤其是制造业企业受益匪浅。

对此,奇瑞汽车河南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副总经理孙新军深有体会:增值税税率降低后,企业实际支付金额减少,资金效率高,周转率提升。“预计企业今年销售量同比增加50%以上,销售额达100亿元。”孙新军表示,减税降费政策给企业“智造”升级提供了充足动力,“我们将不断加强智能化、绿色化、技术化改造,赋能企

业发展和转型升级。”

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复杂多变,企业面临诸多挑战和压力,减税降费政策无疑为企业提振了发展信心。为将好事做好,河南省政府两次召开全省减税降费政策新闻发布会进行政策解读;财政、税务、人社等部门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多部门协同推进,及时解决政策推进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税务部门开展多渠道、广覆盖的减税降费政策宣传和培训辅导,为企业解惑答疑,抓好“开好票”“报好税”“算好账”三个重要节点,层层压实责任,打通减税降费政策落实的“最后一公里”,切实保证企业尽享政策红利。

减税降费对企业效益是“加法”,对政府收入却是“减法”,不可避免会减少财政收入。经初步测算,预计今年河南省全口径收入减收740亿元左右。为有效应对这种情况,河南省委省政府提出要过紧日子的财政方针,要求2019年各级财政大力压减一般性支出。同时,坚决要“保工资、保运转、保基本民生”,真正兜住兜牢民生底线。

减税降费政策的深入推进,为河南省实体经济带来了真金白银的实惠,也进一步激发了市场主体活力。河南省税务局统计数据显,今年前5个月,河南省累计新增减税降费330.3亿元,其中新增减税290.7亿元,新增社保费降费39.6亿元。企业负担明显减轻,营商环境优化,各方面获得感显著增强。(樊雯)

● 投资环境

埃及议会初步批准 修订《投资法》

据《今日埃及》消息,由阿里·阿卜杜勒·阿尔担任主席的埃及众议院(议会下院)日前初步批准了对2017年第72号法—《投资法》的新修正案。投资与国际合作部长萨哈尔·纳斯尔在参加议会经济委员会会议时表示,新修正案的目标是解决当前吸引投资面临的问题和挑战。纳斯尔表示,修正案的目标是拉动最贫困省份的投资,提高民众生活水平以及全国经济增长来源的多样性。修正案的主要内容包括:针对第11—13条的修正案旨在根据部长理事会决定确定的规则和条件,为扩大现有投资项目提供奖励,享受奖励需满足新增增加的条件,包括经营实体需建立新的生产线或生产新产品,并通过增加资本创造新的就业机会;第二项修正案是为公司增加资本的批文手续费设置上限,不论其受哪种投资机制的约束;规定由投资总局(GAFI)负责计算外国资本流入和外国直接投资,以便获得投资额的准确数字。

(驻埃及使馆经商处)

水电供应问题影响

坦桑尼亚滨海省投资环境

据坦桑尼亚主流媒体《公民报》报道,坦工贸部长日前赴滨海省考察投资环境,了解当地企业面临的主要问题。投资者普遍反映,供水不足和供电不稳定严重影响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坦工贸部长当即指示当地水电供应部门一次性解决问题,切实保障投资环境。据悉,由于滨海省距离达港不远,且工业用地充足,目前成为仅次于达省的坦第二热点投资省份,已注册大中小工业企业450家。

(驻坦桑尼亚经商代表处)

瑞典备用电力短缺

据《今日工业报》报道,瑞典国家电网发布报告称,随着未来几年部分核反应堆陆续关闭,瑞典备用电力生产能力将随之下降。目前瑞典冬季的电力赤字约为1000兆瓦,预计未来冬季用电高峰时的电力赤字将增加两倍。报告呼吁政府、各机构和电力行业迅速采取措施扭转电力产能下降趋势。

(驻瑞典经商参处)

“反驳舆论最可信的武器就是严谨、客观和科学的学术研究”

伦敦大学一项研究为在非洲中企正名

■ 本报记者 张凡

上沉重的债务,剥夺当地人的就业机会、支付低工资等问题进行了调研。该研究团队选取安哥拉和埃塞俄比亚这两个中国对非洲投资数额最多的国家,对中国企业和其他国家制造业、建筑业企业进行了调查。这项调查历时4年,研究团队实地走访76家企业,其中31家是中国企业,访问了共计1500名安哥拉和埃塞俄比亚当地员工。

研究发现,外媒报道的关于中国企业负面报道大多不属实。研究人员指出,很多欧美人所谓的中国企业给非洲国家造成“债务陷阱”或低薪雇佣当地员工的说法,几乎都是道听途说。研究发现,中国企业聘用本地员工的比例与非洲其他国家相同,而且中企在提高非洲国家就业率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研究还表明,并没有证据显示

中国雇主给本土员工的待遇与非中国企业有很大差异,中国企业为当地员工支付的薪资与其他外国企业相差不多,员工培训标准也与其他外国企业相似。

先来看看中国企业在这两个国家雇佣本地员工的情况:

在埃塞俄比亚,研究团队发现,中国建筑企业和工厂中埃塞俄比亚员工的比例超过90%,根本不是外媒所说的放眼望去全是中国人的场景。在这些企业,中国员工从事的是管理、财务或高技术工作(例如木工或生产线主管),这是因为受过训练、能够做这些工作的埃塞俄比亚人可能不好找(至少一开始是这样)。而在低技能岗位上聘用的都是本地人。

在安哥拉,包括中国企业在内的所有外国企业聘用本地员工的比例都较低。研究发现,安哥拉在

独立后还进行了长达20年的破坏性内战,这使得安哥拉的高技能劳动力短缺情况十分严重。尽管如此,中国企业在安哥拉聘用的本地员工比例已从10年前的大约50%提高到如今的大约74%。

因此,研究团队得出的结论是,中国企业并没有剥夺非洲本地人的就业机会,而是提供了更多的就业岗位。相关数据显示,2017年在海外企业承接的所有非洲建筑业务中,大约60%流向了中国承包商。

在薪资方面,研究发现,在埃塞俄比亚和安哥拉,员工的薪资更多的是由员工本人的技能、经验和所属阶层决定,而不是由雇主的国别决定。简单地说,中国企业支付的薪资跟同行一样。在安哥拉,“中国建筑企业有时候支付的薪资确实比其他国家企业低

20%,但中国企业提供免费的食物,这意味着当地员工可以将更多薪水储存下来。

“这个项目的重点是剖析现象本身。我认为,反驳舆论最可信的武器就是严谨、客观和科学的学术研究。我们希望以这个项目抛砖引玉,一方面鼓励学术界特别是国内学术机构开展此类研究,另一方面也让西方激进政客、媒体和某些学者,包括一些非洲国家政府官员反思,他们不该用陈旧、固化思维看待正在发生的事情。”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发展研究系博士研究生、该项目研究助理陈卫炜对这次深入的调研深有体会。在此之前,正是因为以调查为基础的报告极少,才使得情绪化、妖魔化、耸人听闻的描述几乎替代了中国在非投资的真实情况,令不少欧美民众信以为真。